

论作业本的符号及其教育机制

段俊吉 熊和平

[摘要]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本的常见符号类型有：行政管理类符号、应考宣传类符号、应试知识类符号和教师评价类符号。作业本的符号功能基本遵循了应试教育的管理法则，体现了两种典型力量的博弈与互动，即教研室与教育培训机构对学校教育实践方式的建构。作业本的符号教育机制主要契合了新行为主义的程序强化理论。只有让作业活动去符号化，并融入学生切实的生活经验，才能培养他们的创造性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作业本；符号；教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9)12-0005-06

作业本是中小学生学习常见的学习用品，其最初的功能是辅助课堂教学、检验学习成果和巩固知识习得。作为教学管理的辅助工具，作业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课堂教学的有序开展。但现在中小学生的作业本越来越呈现符号化的趋势，致使学生被符号化的作业所包围，他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一切的意义都隐藏在符号之后”^[1]，作业本也成为符号教育的工具。作业本在表面上是作业题型及题目的文本形式，背后却隐藏了学校教育、符号管理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动态关系。它承载了建构作业知识的功能与使命，对学生的课业任务提出了相应的规定性要求。解读作业本的符号类型、背后的典型力量及其教育机制，将有助于剖析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课业负担的实质，进一步改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体系。

一、作业本的符号类型及其成因

近四十年来，中小学生学习本的内容、形制和风格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教育符号学意义。当前，多维度的符号成为构建作业本的关键元素，体现了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如果说，“符号是工业和行政程序化的产物，是权力策略的一部分”^[2]，那么，作业本符号也是学校教育领域内的权力策略的表征。大体上说，作业本的符号类型主要有行政管理类、应考宣传类、应试知识类和教师评价类，它们的形成原因各有不同。

（一）行政管理类符号

学校教育的行政管理类符号自古便有。在我国古代，部分私塾采取统一的作业本印模，刻有“三

段俊吉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

熊和平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研究员 博士 315211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学校物件的教育文化研究”（BAA190229）的成果之一。

元及第，凌云阁制”的字样。“三元及第”，即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中获取第一名的解元、会元与状元，意在鼓励学子勤学进取，从基层到中央不断地考取功名；“凌云阁制”则为印刷机构的统一标识。然而，当代的作业本“被官方主流文化用来构筑意识形态工事”^①，而规范化的符号则是作业活动行政化管理策略的投射。比如，有的作业本在封皮上印有市（县、区）“统一校簿”或“学生课业簿册”等字样。同时，作业本的封皮通常印有“学校”“年级”“班级”“姓名”“学号”等学生个人信息，这是一种行政化的身份标识。

作业本的行政管理类符号是学校教育行政化的一种细微表征，体现了我国公办学校课堂教学的基本秩序。就符号编码的内在成因而言，这类符号是学校系统中行政校、行政班、行政组等管理模式下的产物。行政符号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地传达某种指令，包括学生的个人信息或行政标识也只是一符号现象，实质上表征了教学管理的行政化。这类符号的编排和运用是对学校机构、班级组织和学生身份的识别与解释，是行政权力和管理权限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映。它借助符号的行政化过程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了一种“在场性”，成为教育场域的微观权力建构的替代和延伸。

（二）应考宣传类符号

应考宣传类符号的产生是教育培训市场化的结果，教育培训市场的兴盛也使得名目繁多的作业本应运而生。这类符号使得作业本的封面发生了“去行政化”的革新，以新颖的图片、精美的设计和醒目的标题逐步占据了作业本的交易市场。这些作业本封面的醒目位置通常印有“提分”“冲刺”“突破”“培优”等激励性口号，它们是应试教育理念的符号表征。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发行的作业本在封面印有“全国创新教育品牌”的字样，在封底印有“XX教育，带你赢在起跑线上”“脚踏实地，栉风淋雨”的宣传口号；有的培训机构在作业本封面印有“抢先起跑”的字样。应考宣传类符号融入了

①“样板美术”是脱胎于样板戏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特定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它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特定的模式。在学校教育领域的“样板美术”体系中，作业本封面上通常印有火箭、飞机、雷达等航天器或者天安门城楼、镰刀铁锤、劳动者的形象等。这些图绘及其结构所蕴含的美学诉求与教育意志成为“政治叙事”的注脚。

教育消费元素，避免了行政管理类符号的单调与刻板。数字复制技术和电子印刷技术盛行于教育培训市场，商业化的广告编码逐渐成为与手写体并行的符号系统。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作业本经历了符号变革的冲击，发生了象征意义层面的更迭。“短小精悍，博人眼球”是应考宣传类符号的基本逻辑，它试图借助视觉感官的刺激和符号系统的重构脱离传统意义上“样板美术”^②的束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样板美术”影响了作业本的图绘与风格，体现了符号化权力在美学形态与教育原则上的一致性。这种现象直到教育培训市场兴起才有所转变，而应试教育制度则成为符号革新的内在动力。应考宣传类符号相当于教育培训机构施与作业本的一种“化妆术”，丰富了应试知识的广告方式及其符号价值。这类符号以巧妙的宣传手法呈现出来，体现了教育培训市场的诱导性与消费主义美学原则，也是应试教育与培训市场之间动态互构的结果。

（三）应试知识类符号

应试知识类符号是指各门学科题目及其对应题型。这类符号的功能指向应试技巧，表现为各类题型及其相应的结构。从题型类别来看主要有两种：客观性题型和主观性题型。客观性题型如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应用题等；主观性题型有“小练笔”“论述题”“作文题”“材料题”等。就题型结构而言，不同学科有各自的题型符号的结构，将相应的学科知识以符号的形式呈现在作业本中，学生不得不通过“刷题”去熟悉作业本的符号套路及其应答技巧。

应试知识类符号迎合了中小学“双基”教学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提出的要求。这类符号教育主要是“以人才选拔考试和应试技巧的需要为导向，注重继承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力求熟练运用”^③，并旨在强化学生对“熟记”“接受”“同化”等趋同性思维的训

练以及外在功利性目的的达成。作业题型的选择和题目的设计并非出题者的符号行为，而是与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教育评价方式紧密关联的。应试知识类符号契合了学校教育将操作性行为主义的教學理念及其符号规训强化给学生的现实需要，框定了学生的求知方式和行为训练的模式。

（四）教师评价类符号

教师评价类符号是教师对学生的作业内容所做的反馈性符号。在中小学教育中，作业本的教师评价类符号大体有：第一，正误符号。教师采取正误符号，以叉、钩或者斜线、方框、圆圈等几何学符号对学生的作业内容进行正误性的判断。第二，星级符号。教师完成基本的正误判断后，以相应的星级符号对学生的作业内容进行等级评定。第三，文字符号。教师的评价符号以文字批注的方式呈现，提供了深层次的质性评价，以供学生自我反思和改进。第四，标点符号。教师往往在文字批注的末尾采用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等促使学生进一步反省的标点符号，借助符码的特殊含义向学生传递评价的立场与态度。

教师作为学生评价的主体之一，其评价观念与评价程序构成了学生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教师的评分意见，都可窥见无形的评价机制对学生人格、习性的塑造功能。”^[6]学生在教师的评价反馈中逐步意识到学校系统的运作模式，也洞悉了符号机制蕴含的选拔和甄别的功能。这种以教师为主体的评价方式旨在将学生置于象征化的符号体系中，使其自觉地认同符号规训的运作逻辑。从现阶段我国教育评价的现状来看，教师评价类符号仍然在学生作业本的符号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类符号有助于教师的知识教学以及提升学生的成绩，是教师的评价哲学的直接体现。

二、作业本符号背后的两种典型力量

基于学科知识教学与班级教学管理的需要，我国公办学校的作业本符号系统一般都有统一要求。这是学校教育规范化运作的体现，也是国家教育意志在学习用品上的反映。“物品的个性化特征是人

附加给物品的，它本质上是人的意识的个性化附加在物品身上的特性。”^[6]同理，物品的符号化特征也是人附加给物品的，作业本的符号化特征是权力结构的附属性，并在不同的人群或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博弈的权力关系。传统作业本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强调其教学辅助功能，这一功能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而附加给作业本的。教师借助作业本引导和管理学生，使学生遵从于特定的学科知识的秩序及其符号逻辑。随着教育培训市场的繁荣及其广告宣传策略的革新，作业本的主要功能也经历了更迭，集中表现在新型的符号体系的建构。这是应试教育的价值在学校、社会和学生之间关系中的显现。教育管理者借助作业本的符号构建教育话语，而“这种‘温和方式’可以成为施展符号规训权力的有效手段”^[7]。

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知识话语的建构有两种力量：一是具有教学行政管理功能的教研室，另外一种是以提升中小学生的应试成绩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在知识管理的行政体系中，省、市、县的各级教研室是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研究中小学教材教法，辅助教师的专业发展；推动学科教学建设，探讨学科建制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学业务管理，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形成体系化的教学方案。规范化和行政化是教研室构建中小学教学秩序的基本准则。教研室以教学组织运转规范化为目的，旨在保证教学质量并提升教学研究水平。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中小学教学指导性机构，教研室拥有作业本的形制、符号和内容的编订权与选择权。比如，这类作业本在封面通常印有“市（县区）教育厅教研室、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开发研究中心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授权配人教版教材使用”等字样。作业本的卷首编写说明也标注了作业本的功能：“作业本以检测学生达到课堂教学目标要求的水平为目的，以多种作业形式为手段，全面体现新课程的要求，是重要的诊断性评价。”^[8]这类文字符号体现了作业本的“官方背景”，是教学行政化管理的直接表现。它们具备统一的行政化标识，对作业本的定位和解释也体

现了教研室及其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对知识组织形式与学生求知秩序的控制。“知识的分类和架构所具有的结构，揭示了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9]权力通过对合法性知识的规定而改革教育策略、维持学校规范，合法性知识又借助分类方式实现了对权力的建构与强化。教研室对作业知识的选择、组织和评价往往是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进行架构的。符号系统的“确指”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弱化了学生对知识以及求知方式的选择权，而强化了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与评价的权力。教研室对作业知识的编码便是建立在这种符号架构基础之上的。作业本的符号系统影响了作业的内容以及知识编排的方式，教研室借助作业本及其符号系统完成了对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规训，作业本的符号功能则实现了从表面结构向深层结构的过渡。

在创制作业本的符号系统方面，与教研室相对应的是教育培训机构以及相关的教育文化产业公司。无论就形制还是符号本身而言，这类机构的作业本有别于教研室的规范化、行政化的要求。它们在封面美学、题型设定和题目选择等方面，让作业本呈现出书本化的趋势，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作业本的封面或封底的宣传标语也更加多样化。比如，有的教育培训机构作业本的封底印有：“‘15天巧夺100分’是全国68所名校教科所专门针对期末复习、考试而研发的一套科学高效的训练方法，它严格遵循新课标对每个学段的目标要求，全面整合教材内容，系统梳理所学知识，合理安排复习计划，使学生在10多天的期末复习时间里达到本学期知识与技能的全掌握、学习巩固效果的最优化、期末成绩的大提升！”^[10]这类作业本借助“15天巧夺100分”等字样突出了“短时间、提高分”的功能，并用通俗化的语言描述了自身优势和提分策略，从而吸引学生及家长的目光。同时，有的作业本在封面印有“黄冈小状元”“状元作业本”“状元优效”等字样，将应试教育重镇与科举制的至高荣誉相结合。有的作业本在封面印有“冲刺100分”“A+优化作业本”等字样，以应试教育的计量评价类字眼迎合家长和学生的消费心理。这类作业本更

具商业化的风格特点和消费性的象征意味，突破了传统作业本单一、规矩的形制与风格。教育培训市场试图通过解构教研室对知识编码的方式来迎合教育培训的市场需求。

作业本符号的功能在于建构形式化的教育实践方式。学生每天写作业，就必须接受符号的教育，通过熟记各种符号的“所指”来获取理想的学业成绩。作业本符号的规训，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观的规训，或特定教育价值观的规训。就教研室与教育培训机构两者不同的知识立场来说，“这种不同知识及可能性的分配并不是基于知识中立的差异，而是带有不同价值、权力和潜在性的一种知识分配”^[11]。知识的属性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在传递的过程中遵循着一种特定的分配原则，反映了权力区分的差异逻辑。教育权力的分配表现在对知识解释权的争夺。教研室和教育培训机构确立知识合法性地位的过程，即是教育实践话语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形成于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它们规范、选择和确定了学校知识的组织形式，规定了作业本的符号“所指”及其评价的价值取向。作业本符号的功能性体现在将学生固定到一些特定的规范上，教育工作也就变成了一项引导学生顺应符号逻辑的工作，“功能性因此不再是真实工作的施与，而是一个形式对另一个形式的适应，并且经过此程序，成为真实工作程序的省略、忽略”^[12]。在学生的作业活动中，形式化的符号功能取代了作业对学生创造思维 and 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评价方式限定了学生所接受的学习内容与方式。作业本的符号系统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学科知识之间形成了高度程序化的行为联结，以保证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作业本的符号系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中小学的教育话语方式，诚然，教育话语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原则，通过占有其他话语并将这些话带入一个特殊的相互关系，以达到选择性传递与学习的目的”^[13]。教育话语方式的建构过程体现了不同价值立场的符号系统对彼此的相互关系的调控。以教研室为代表的知识管理的

行政部门试图借助作业本的符号功能强化对国家课程及其“官方知识”的解释，而以教育培训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则希望拥有独特的品牌形象，并确立以提分效益为目的的“市场知识”的解释体系。它们对符号权力的建构最终都转化为日常教育实践的逻辑，学生能做的，只有去接受来自作业本的符号教育了。

三、作业本符号的教育机制

在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中，作业本符号及其权力逻辑存在特定的教育机制，对学生施以持续且弥漫性的影响。有的社会符号学者认为，“权力流动在符号的不确定性与变动性中，权力变成符号并在符号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14]。作业本的运作逻辑被流动的符号所定义，进而生成了相应的权力关系。对作业知识的解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符号权力的流动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培养在既定评价体系内的“受教育者”。文本教育的符号功能使得“受教育者”服从学校纪律、接受给定规范，决定了教育者选择什么样的知识以及用何种方式呈现和解释知识。作业本符号构建了一种适合当代教育语境的习性结构，“什么样的习性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15]。在作业本多重符号的共同作用下，学生的认知系统和行为方式最终达成了符合标准的规范性。作业知识遵循了严格的文法规则，背后体现了符号权力编码化和结构化的过程，也催生了相应的符号教育。

在符号教育的作用下，作业本的物品属性的象征意义隐退了，规训价值替代功能价值而占据主要地位。“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16]作业本的符号编码处于特定的体系范畴中，遵循了规范化的符号组合方式和行政化的教学管理规则。当代学校教育受到符号的支配与管理，作业本的符号化成为文本教育构建秩序的基础。学生自觉地认同作业知识的组织形式和解释方式，在深度内化的过程中接受来自符号的教育，并形成惯习性的符号认知模

式。从教师的评价方式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应用来看，学生对作业知识的符号编码产生了特定的敏感性和同化性，背后体现了符号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符号的编码法则，学生将作业本的多重符号逐步纳入认知系统，内化为普遍的符号规则。以应考知识类符号为例，学生对作业知识的习得并不是主体的能动行为，而是在被纳入“知识-符号”框架后对规范化知识形成了特定的刺激-应答行为。这是被动培训化的结果，学校教育的价值被降格为一种培训教育。“权力是通过心智系统的塑造规定了身体习惯和精神倾向，而符号权力的隐秘生产正是教育机制的核心作用。”^[17]在行政管理等多类型符号的共同作用下，作业本符号体现了社会变革、教育机制对学生的塑造，使得学生对特定符号系统形成了固定的知识发生学机制。同时，基于文本化、形式化符号的内在刺激以及应运而生的符号规训，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也遵循特定的实践逻辑，即符号实践。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8]。这种刺激-应答的行为体系一旦建构起来，它便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学生会自觉地遵守和内化。这种固化模式体现了新行为主义的强化理念，是形式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

“行为需要不断的刺激，直到它获得更强的力量为止。”^[19]在既定的“知识-符号”的训练框架中，教研室与教育培训机构关于知识解释权的争夺演化为关于符号系统的较量。最初，作业本的符号教育处于知识规训的前期阶段，即通过对知识的反复呈现刺激学生的认知系统，强化学生对应考知识类符号的条件性反射。当符号教育进入后期的规范化阶段，知识规训以一种不可视的方式掩盖了外部的行为刺激，学生会形成自发的操作性应答行为，实现了从“他组织”到“自组织”的管理过程。“强化是教育机构为了建立条件作用而安排的一种手段。诸如‘训练’、‘练习’、‘实践’等教育所使用的强化物具有人工性。”^[20]作业本的应试知识类符号是对学科知识的经常性强化，当这种强化达

到相应的程度,便无需来自外界的行为引导和刺激,学生会建立起对目标知识和技能的持久性反应。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可以提高答题的准确率,而且可以提升在大题量的符号应答行为中的速度。

新行为主义的符号规训是作业知识建构的内在动力,为知识的选择、分类和传递提供了认识论前提。“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的教育具有一种异化的力量,而且知识内容也是虚假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21]作业知识是形式化的符号表征,基本遵循了以应试为取向的知识组织方式。通过对学生思维和行为的训练,教育者使符号教育具备了合理性,而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则是形式化教育的证实程序。作业本集合了中小学教育中典型的符号元素,蕴含了教导性法则并规约了学生的行动意向。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它体现了教育体系中教学和评价的象征关系。这种象征关系使得教育愈发偏离教育的本真,逐步成为一种符号教育,而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则成为中小学生的特征。

通过对作业本的符号体系及其教育机制的剖析,我们亟待重新审视学生的课业负担的深层次根源以及知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学生来说,走进学校,学到什么样的知识才算有价值?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提醒过:“直到你摆脱了教科书,烧掉了你的听课笔记,忘记了你对考试而背熟的细节,这时,你学到的知识才有价值。”^[22]因此,只有让作业方式融入学生的生活经验,实现从“符号性知识”向“实践性知识”的转变,才能真正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和实践智慧。

[注释]

[1] 吕红周.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143.

- [2] Kellner, 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M]. Cambridge: Wiley-Blackwell Press, 1994: 78.
- [3] 张闵.符号车间:流行文化关键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13.
- [4] 邝孔秀,宋乃庆.我国双基教学的传统文化基础刍议[J].中国教育科学,2012,(4).
- [5][15][17]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2、60、194.
- [6] 李齐,张三元.穿越“符号化”生活幻象的路径——鲍德里亚思想道路特点的一个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7).
- [7] 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6.
- [8] 参见: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开发研究中心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语文作业本(四年级下)[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
- [9][21] Young, M. F. 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Publishers, 1971: 48, 89.
- [10] 参见:68所名校教科所主编.15天巧夺100分[Z].长春:长春出版社,2018.
- [11][13] 巴兹尔·伯恩斯坦.教育、符号控制与认同[M].王小凤,王聪聪,李京,孙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序言8、35.
- [12] 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53.
- [14] 林信华.社会符号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145.
- [16]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 [18] 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3.
- [19] B.F.斯金纳,邹芳,钱扑.美国教育的耻辱[J].外国教育资料, 1996,(5).
- [20] 乐国安.从行为研究到社会改造: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33.
- [22]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8.

(责任编辑:刘宏博)